

本 卷 导 论

一 中华民族的大觉醒

1937 年 7 月 7 日，随着卢沟桥头中国守军对蓄意制造侵略事端之日军的奋起还击，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民族自卫战争正式打响，中国历史由此进入抗日战争时期。抗日战争历时 8 年，中国人民打败了不可一世的日本帝国主义，取得了自 1840 年鸦片战争以来没有过的大规模的反侵略战争的胜利。抗战结束后，经过 4 年解放战争，中国人民又推翻了国民党的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抗战爆发到新中国成立，前后历时 12 年，这是中国历史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迅猛推进的年代。这期间，社会思想领域也经历了一场场激烈的斗争，在历史法官面前，各类不同的社会思潮都接受了极其严格的裁判。

思想领域所呈现的新面貌以及发生的新变化，是与这一时期中华民族的新觉醒紧密联系在一起。抗日战争是日本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人民的一场战争，日本的全面侵略，使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的严重危险。在生死存亡的关头，只有全民族团结抗战才是中国生存和发展的唯一出路。这种特定的政治环境促成了中华民族的全面觉醒。

作为中华民族觉醒的重要表征，首先是代表中国两大政治势力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从十年内战转为重新合作，并且以此为重心，结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是中国政局的决定性因素。共产党早在被“围剿”中就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了各种努力。1935年12月，中共中央瓦窑堡会议通过建立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决议；1936年5月放弃“反蒋”口号，同年12月坚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凡此种种，都是共产党推动蒋介石转向抗日的重要步骤。七七事变加快了国共两党靠拢的进程。在共产党催促下，国民党中央通讯社于9月22日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实际上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中共的《宣言》和蒋介石谈话，标志着国共两党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这一重要的历史事件，改变了国内政治形势，其对抗战战争的意义不可低估。

日本的侵略早已激起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国共两党合作的实现使人民的抗战热情更加高涨。“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唱着这首悲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各阶层人民纷纷投入抗日的洪流。在沦陷区的广大农村里，农民自己组织起来与敌人进行斗争。河北、山东等地，各种名称的农民自卫武装风起云涌。他们竖起“抗日自卫”“剿匪、抗日、保家、卫国”大旗，号召群众。抗战爆发后，延安成为先进青年向往的圣地。大批爱国青年从四面八方奔向这里，又从这里奔赴全国抗日前线。与此同时，一部分实业家、工厂主，抱着“为宗国效力”“誓不以厂资敌”的决心，在敌机狂轰滥炸、运输十分困难的条件下，拆卸工厂设备，往内地迁移；而更多的民族工商业者，则是以踊跃购买救国公债、为前线捐赠钱物等方式，表达他们的抗日心愿。海外广大爱国华侨时刻牵挂着祖国的命运，他们不忍祖国惨遭敌寇铁蹄的践

踏，不忍自己的同胞惨遭敌寇的蹂躏，也积极投入到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中，如在新加坡成立的以陈嘉庚为主席的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其分支机构遍及东南亚各国。欧美各国的华侨也纷纷建立抗日救亡团体，进行抗日宣传，筹集现款、物资，组织华侨青年回国参军参战。

抗日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包括工、农、商、学、兵各界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抗日团体、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和海外侨胞在内的所有不愿作亡国奴的中国人广泛参加的一次规模空前的民族解放战争。这种全民族抗战局面的出现，说明中华民族具有极大的凝聚力，我们这个伟大民族从睡梦中真正觉醒起来了。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侵略者所面对的就不再是少数仁人志士的孤军奋斗，而是整个中华民族用自己的血肉筑起的新的长城，是陷敌于灭顶之灾的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这便从根本上决定了抗日战争的进程和结局。

中华民族的民族觉醒和奋起抗战，最终打败了日本侵略者，赢得了民族解放；同时它也必然伴随着中国人民的进一步觉醒，造成中国社会的解放。近代以来，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以后又加入了官僚资本主义）实行对中国的联合统治，导致中国的国势衰弱和民生凋敝，迫使人民不得不起来从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这种斗争时起时伏，潮涨潮落，但从未停歇，至抗日战争爆发，更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它自成立之后一直是中国革命的领导——一方面通过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广泛地发动和团结一切爱国力量抗击侵略者；另一方面又通过一定的民主改革和民主运动，保障人民利益，发展人民力量，巩固抗日阵线，从而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的社会进步。经过抗日战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先后在华北、华中及华南等地区建立了 19 块抗日根据地，面积达 100 余万平方公里，人口一个多亿；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抗日武装的主力部队发展到 120 余万人，民兵发展

到 260 余万人。率先获得解放的根据地人民，不仅是争取民族解放的重要力量，而且是推进民主革命、社会解放的主力军。大后方的中间党派、爱国团体和人民群众的力量，也在民主运动中得到空前的锻炼和发展。这样，抗日战争在打败侵略者的同时，也为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开辟了道路，为新中国的到来准备了条件。因此，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一结束，新中国与旧中国的最后决战便立即拉开帷幕，这便有了历时 4 年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解放战争的结果，是长期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被推翻，长达 22 年之久的国民党政权的统治被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诞生在世界的东方。这一切，标志着民主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和中华民族独立、振兴的新时代的开始，也标志着中国人民走向全面新生活的开始。

综观从抗战爆发到新中国成立这一段历史，人们不难发现它无论对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还是对其社会解放，都带有决定性的意义。人民的空前觉醒加快了历史前进的步伐，历史在人民的觉醒中发生着巨变。伴随着这一历史的巨变，思想领域也难免风起云涌、惊涛拍岸了。

二 不同建国主张的交锋、搏击

由抗日战争开启的中国历史新阶段，其社会政治生活首先是由中国与日本之间的民族矛盾所决定的，与此相适应，这一阶段的社会思潮，也必然首先是中日民族矛盾及其发展趋势的反映。

同军事、政治领域的情形一样，这一阶段在思想领域最为活跃的仍然是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九·一八以后，国民党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同共产党形成尖锐对立。华北事变之后，

国民党改变了这一方针，将政策的重心逐渐转到反对日本侵略者方面，表现了政治上的重大进步，因而受到共产党的欢迎，也受到国统区广大中间派爱国民主人士的欢迎和拥护。

国内各大政治力量特别是国共两党在应否抗日的问题上没有什么争论了，但在如何抗战的问题上，则在抗战一开始就存在严重分歧，并形成两条截然不同的对抗日战争的指导路线，这就是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和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共产党指出，中国是有力量进行抗战并最终取得胜利的，这种力量的最深厚的根源蕴藏在广大人民中，只有动员和组织人民，才能抵御强敌。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在全国进行必要的政治经济改革，废除国民党的一党专政，给人民以充分的抗日民主权利，适当地改善工农大众的生活。共产党的主张很清楚，就是要使抗日战争成为真正的人民战争。与此不同，国民党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力图使抗战的进行不致损害其统治地位，并且在打败日本后继续其统治，因而它害怕人民力量在抗战中发展，拒绝一切有利于抗战的根本改革，反对抗日战争成为人民大众的抗战，只愿意实行政府和军队的单纯抗战。

国共两党的上述分歧又在抗日统一战线内表现得相当尖锐和难以调和。它的实质在于，抗战条件下的中国是否需要同时进行一场政治经济的根本变革？更进一步，战后的中国是继续维持国民党的一党专政，还是由各党各派联合掌权？显然，这些分歧远远超过了抗战问题本身，它生动地反映了抗战时期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民族革命与民主革命相互交错、相互影响的复杂情形。

在各自不同的战场上，国共两党以不同的方式抗击着日寇。日本的力量因受到不断的打击而由强变弱。与此同时，国共两党两种不同抗战路线、政治主张的争论乃至斗争也愈来愈激烈。至抗战后期，随着形势的变化，原来的如何抗战之争就正式演变为如何建国之争了。

在关于如何建国的争论中，国民党似乎气势不凡。一方面，它

由蒋介石亲自上阵,大谈所谓“中国之命运”,鼓吹“一个党、一个主义”,公然宣布“中国的命运,完全寄托于中国国民党”,宣布蒋记“三民主义是国家的灵魂”。^①同时,反动文人叶青等也以“研究三民主义”为名,连篇累牍地论证“共产主义不适于中国”,^②实际上是为国民党的“建国”事业呐喊助阵。尽管如此,国民党在论争中却很被动。这不仅由于其“理论”贫乏,更由于其自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所实行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使其逐渐失去人心。一个明显的例证是,抗战初期“一致”拥蒋抗日的中间派人士,开始逐步认清了国民党坚持独裁、反对民主的真面目和共产党政策的正确性,并展开了争取民主宪政的斗争。皖南事变后,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及其坚持抗日、加强团结、结束党治、实行宪政、实践民主、保障自由等政治主张的提出,既表明在国共两党的论争中加入了一支新的力量,也表明论争的天平在向共产党一端倾斜。国民党的处境愈来愈不利了。

然而国民党所面临的最大挑战还在 1944 年以后,即豫湘桂战役大溃败之后。豫湘桂战役是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推进的形势下发生的,可是国民党军却丢城失地,溃退千里。这样的失败已无法再以敌我力量悬殊等原因来搪塞,而只能以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来解释。军事的失败说明政府的无能,政府的无能暴露出政治的落后,于是,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便成为人们(包括许多中间派人士)的普遍要求。这种状况在以前是不曾有过的。抓住这一有利时机,中国共产党于这年 9 月正式提出“联合政府”的口号,将自己的政治主张明白公布于世。中共的主张一提出,立即引起强烈反响。国统区各界爱国民主人士纷纷响应,中国民主同盟也于 10 月发表《对抗战最后阶段的政治主张》,把“立即

^①蒋介石:《中国之命运》,《蒋总统著作全集》,第 166 页。

^②叶青:《怎样研究三民主义》(下篇),第 58 页。

结束一党专政，建立各党派之联合政权，实行民主政治’^①作为其主张的重要组成部分。民盟作出这样的政治表态，反映出一个重要的政治动向，这就是，“联合政府”不只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它已经成为包括中间势力在内的广大人民的共同政治意向。

人们通常说，抗战胜利前后，中国出现了 3 种建国方案。这一说法完全符合实际。3 种建国方案可以作这样的定性归纳：一是由国民党统治集团所代表，主张维持所谓的“中华民国”，实即在此名义下继续实行地主买办阶级的专政；一是由共产党所代表，主张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一是由中间党派即中国民主同盟所代表，主张建立一个“十足道地的民主国家”即欧美式的资产阶级共和国。3 种建国主张，既是抗战以来几种主要政治主张的延续和发展，也是战后国内斗争的实质内容。当然，3 种方案归根结底指示着两种中国之命运，即中国继续作为一个不独立、不民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而存在，还是由此走向独立、民主、富强。国民党坚守前一种中国之主张，共产党则下决心实现后一种中国之理想。在两个中国之命运的斗争中，国民党由于违背历史的潮流而失去人心，陷入孤立，共产党由于顺应历史的发展趋势而得到人民的广泛拥护，中间党派则在历史的紧要关头，审时度势，放弃了自己的旧民主主义立场，公开宣布接受新民主主义，与共产党进行从思想上到政治上的合作。于是，到了 1949 年，随着军事上国共双方决出胜负，思想政治上两种中国之命运的斗争也终见分晓，这就是地主买办阶级的建国方案被中国人民彻底抛弃，人民民主专政的新民主主义建国方案在中国大地得以实现。

历史就这样在两种中国之命运间作出了抉择。

^① 《中国民主同盟对抗战最后阶段的政治主张》，《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 年版，第 32 页。

三 主导思潮地位的确立

民主革命时期最后 12 年的思想领域，几种主要政治思潮都摆开了强大的阵势，展开了最后的较量，其结果是新民主主义战胜其他种种思潮而成为主导思潮，取得了支配地位。新民主主义的胜利不带有偶然因素，理论的成熟及其所具有的先进性，本身就包含着一种必然。

作为一种用以指导社会改造的理论，新民主主义是伴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本土化而逐步展开的。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始于五四时期，它在中国这个古老的东方国度所结出的第一个果实是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及其开展的革命运动，又加速了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进程。但是整个说来，在抗日战争以前的十多年里，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把握还十分有限，马克思主义还没有以中国化的形态进入多数中国人的思想意识。进入抗日战争时期以后，情形大为不同了。这时，马克思主义得到进一步的传播并实现了它的中国化，其社会影响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扩展开来。

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传播和产生广泛深入的社会影响主要体现于以下几个方面^①

一是摆脱教条主义束缚，真正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思想来观察中国社会、历史，指导革命斗争实践。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人认真总结了以往两次国内革命战争实践中所取得的成功经验特

^① 此处的概括参考了刘大年《抗日战争的几个问题》等文。见《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文集》上卷：《全民御侮》，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 年版。

别是 1927 年和 1934 年两次失败的教训，深刻认识到思想上的教条主义是中国革命在理论上的最大敌人，认识到必须紧密结合中国实际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这就是毛泽东说的，要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射中国革命实践之的。基于这种认识，中国共产党顶住国际国内的种种干扰，在政治上和思想上摆脱种种旧的、不适当的公式，破除教条主义的束缚，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原则，独立自主地观察、处理中国革命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从而使马克思主义上升到一种新境界。

二是在学术文化领域宣传、阐发促进民族解放和社会进步的思想理论，抵制、批判妨害民族解放和社会进步的思想主张。³⁰—40 年代，在国统区思想文化领域中，形形色色的理论主张层出不穷，其中颇具影响者主要有倡导儒学的文化保守主义、战国策派的“战国时代重演”论、叶青等人的‘三民主义研究’以及自由主义思潮。还有唯生论与力行哲学以及其他牌号的唯心论哲学，等等。这些理论主张虽互有区别，但它们在政治上都不同程度地适应了国民党统治集团的要求，在哲学上都属于唯心主义阵营。在它们极力表现自己的同时，马克思主义者积极参加论辩和展开批判，剖析其理论的实质，揭露其政治上的危害，从而使文化思想领域的斗争沿着有利于民族解放和社会进步的方向发展。

三是新民主主义理论形态的完备。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曾提出过若干新民主主义的基本思想。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时，从理论上将新民主主义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到抗日战争时期，这一理论经过毛泽东的总结，发展成为完备形态。新民主主义理论的中心是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第一步，民主革命；第二步，社会主义革命。其中的民主革命，不是一般的民主主义革命，而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即新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目标，就是要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在中国建立一个以无产阶级为领

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改变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地位，使之成为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从而为走向社会主义社会开辟道路。20 世纪的中国，有两位伟人先后提出了关于中国社会改造的理论，一是孙中山，一是毛泽东。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代表了 20 世纪前期中国人对自己所处环境条件的认识与应当如何前进的主张。新民主主义理论则代表了孙中山以后的中国人对自己所处环境条件的认识与应当如何前进的主张。它们都是中国人的伟大创造，但后者具有更深远的意义。它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它成为引导中国人民在复杂环境中胜利前进的理论旗帜。

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的传入给中国思想界送来了一股清流，为中国社会展示了一派新的前景。抗战开始后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传播以及中国化的完成，则确立起新民主主义在中国思想界的主导地位，并且极大地加速了中国奔向光辉前景的进程。这就如同马克思主义自 19 世纪 40 年代产生以后便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思想也不可避免地改变了人类历史进程一样，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具有完备型态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是这一时期思想领域出现的最伟大最先进的成果；它在不断克服和战胜其他种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过程中走向最后的胜利。这便是民主革命最后 12 年里社会思想领域最显著的特征。

第十三编 抗日救亡思潮的兴起与发展(下)

第一章“七七”事变后中国共产党抗日救亡思想的深入发展

一 全面抗战路线的提出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突然向驻守卢沟桥的中国军队发动进攻，中国守军被迫奋起抵抗。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进一步唤起了中华民族团结御侮的抗战意识，抗日救亡思潮迅速席卷神州大地。奋起抗战、救亡图存成了时代的主旋律。

中国共产党站在时代的最前列，从全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提出了全面抗战的主张，指出，抗日战争必须是全国人民总动员的完全的民族革命战争，即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

7月8日，也就是卢沟桥事变发生后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即向全国大声疾呼：“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通电号召全国同胞、政府与军队紧密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①

^① 《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彭明编：《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5册（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3页。

同一天,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贺龙、林彪、徐向前等,以红军将领的名义,联名致电蒋介石,力主“实行全国总动员,保卫平津,保卫华北,规复失地”,并表示红军将士愿意“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①在这里,中国共产党已经十分清楚地意识到,日本侵略军悍然进攻卢沟桥,绝非一个单纯的地方性武装挑衅事件,而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一个严重信号,中华民族已处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只有实行全民族抗战,实行全国总动员,才能抵御日寇侵略,救亡图存。

7月15日,中共中央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给国民党中央。在这个宣言中,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实现全民族抗战的3项基本政治主张:一是争取中华民族之独立自由与解放,切实而迅速地准备和发动民族革命战争,以收复失地,恢复领土主权之完整;二是实现民权政治,召开国民大会,以制定宪法与规定救国方针;三是实现中国人民之幸福与愉快的生活,首先须切实救济灾荒,安定民生,发展国防经济,解除人民痛苦与改善人民生活。为了实现上述主张,表示中国共产党的诚意,中共中央再次郑重宣言: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实现民权政治,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取消红军名号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日前线之职责。宣言还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这样做,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以抗日大局为重,“求得与国民党的精诚团结,巩固全国的和平统一,实行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以使用统一团结的全国

^①《红军将领为日寇进攻华北致蒋委员长电》,《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5册(上),第24页。

力量，抵抗外敌的侵略”。^①随后，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同国民党代表蒋介石、张冲、邵力子等在庐山举行谈判。中共代表提议以上述宣言作为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但由于蒋介石这时仍抱有对日媾和的幻想，希望对卢沟桥事变实行所谓“地方解决”，使中共的提议被搁置了起来。

7月21日，中共中央在《中央关于目前形势的指示》中严肃指出，卢沟桥事态正在扩大中，日本政府的种种行动表明，其首要的目的是直接占领平津，然后再占领整个华北。中共中央认为，事变的发展将出现两种可能的前途：一种前途是“事变发展为积极的抗战，以至发展到全国性的抗战，这是全国人民的要求，也是挽救平津与华北与全国免于沦亡的唯一出路”；另一种前途则是对日本帝国主义作出让步与妥协，这种前途对中国完全不利，“它只能把平津华北葬送给日寇作为以后继续侵略的有利阵地”。中国共产党的总任务是要争取第一个前途的实现，反对一切丧失任何中国领土主权的妥协。围绕这一总任务，中共中央提出了5项抗战的具体主张：（1）全国海陆空军总动员，实现对日作战；（2）全国人民总动员，立刻开放党禁，开放爱国运动，满足人民的迫切需要，实现大规模的组织民众与武装民众；（3）全面的抵抗，不但要在军事上实行抵抗，而且必须根绝日寇在中国的一切政治上经济上的特殊势力与汉奸亲日派；（4）统一的积极的抵抗，立刻集中抗战的军事领导，建立各个战线上的统一指挥，决定采用攻势防御的战略方针，大规模地在日寇周围及其后方发动抗日的游击战争，以配合主力军作战；（5）建立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立刻使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机构民主化，容纳各党派的代表参加国民会议与政府，肃清一

^① 《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6-78页。

切亲日派汉奸分子，实现国共两党的亲密合作。^① 这个指示实际上已经提出了全面抗战的主张，并将其具体化，即要动员政治、军事、民众、统一战线等方面的一切积极力量，进行全国性的抗战。两天后，中共中央又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华北的第二次宣言，再次重申了前述 5 项主张，强烈要求“立即实行全面的对日抵抗，停止对日外交谈判，实行武装缉私，抵制日货，没收日本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银行矿山工厂与财产，取消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政治的与经济的特权，封闭一切日本大使馆领事馆与特务机关，逮捕一切日本侦探与汉奸，解除日寇与汉奸在中国内地的一切武装的与非武装的团体”，“立刻实施财政经济土地劳动文化教育等各种新政策，以巩固国防，改善民生”；“立刻实现抗日的积极外交，拥护国际和平阵线，反对法西斯侵略阵线，同英美法苏等国订立各种有利于抗日救国的协定”等，^② 这次宣言使中共全面抗战思想得到了初步完善和发展。

7 月 23 日，毛泽东发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旗帜鲜明地向全国指出对付日本的进攻存在着“两种方针”、“两套办法”和“两个前途”，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战主张。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主张坚决抗战，反对妥协退让。在坚决抗战的方针之下，中国共产党要求有一整套的办法，这就是：全国军队的总动员；全国人民的总动员；改革政治机构，使政府和人民相结合；抗日的外交；宣布改良人民生活的纲领，并立即开始实行国防教育；抗日的财政经济政策；全中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实行这样一种方针和办法“就一定

^① 以上参见《中央关于目前形势的指示》，《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 5 册（上），第 190—191 页。

^② 《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华北第二次宣言》，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选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四），人民出版社，1979 年版，第 8 页。

得个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实现中国自由解放的前途”。^①

卢沟桥事变的结局未能按照国人的主观意愿向好的方向转化。7月30日,北平、天津相继陷落,日本侵略军的铁蹄终于踏破了华北国门。中华民族已陷入存亡绝续的严重危机之中,全国要求武装抵抗日本侵略,实行全面抗战的呼声空前高涨起来。诚如张闻天所说:“各地的大资产阶级,国民党的各地党部、国民革命军的将领及各地方的军政长官,也表示了他们的积极,提出了抗战的要求。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到处要求行动的统一,并且到处组织了这类统一救亡的组织,这使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前进了一大步。”^② 这使中国共产党更加认识到,实行全面抗战已经迫在眉睫,刻不容缓。为此,延安《新中华报》以“迎接大规模的民族革命战争”为题发表社论,指出日寇进攻华北“目的是在于攫取华北,以致整个中国”。而平津失守“华北万分危急,中华民族的生命已经临到最后的一刹那。……此其时矣,非坚决抗战不足以挽救目前的危机”。社论敦促南京国民政府下最后坚决抗战的决心,采取积极的军事行动,发动广大人民参加抗战,以收复平津,保卫华北,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③ 8月9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有部分政治局成员和各部门负责人参加的重要会议。张闻天作了《平津失守后的形势与党的任务》的报告,认为形势的发展,将必然从局部的应战转变为全国性的抗战,目前“我党的工作中心,是争取全国性抗战的发动与胜利”。报告重申了中国共产党前述关于实行全国性抗战的具体主张。^④

^①毛泽东:《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45-350页。

^②张闻天:《平津失守后的形势与党的任务》,《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52页。

^③《迎接大规模的民族革命战争》,延安《新中华报》社论,1937年8月3日。

^④张闻天:《平津失守后的形势与党的任务》,《张闻天选集》,第152-154页。

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全面分析了抗日战争爆发后的政治形势，正式提出了全面抗战路线及其纲领。会议指出，卢沟桥的抗战“已经成了中国全国性抗战的起点”；中国的政治形势从此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这就是“实行抗战的阶段”。在这一阶段，“最中心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而争取抗战胜利的关键是“使国民党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只有这种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才能使抗战得到最后胜利”。^①在“决定”中，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抗战思想得到了全面的系统的阐述。

会议根据全面抗战路线，向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和全国人民提出了著名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其基本内容是：第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对日绝交，驱逐日本官吏，逮捕日本侦探，没收日本在华财产，否认对日债务，废除与日本签订的条约，收回一切日本租界；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反对任何的动摇妥协。第二，全国军事的总动员。动员全国海陆空军，实行全国抗战；反对单纯防御的消极的作战方针，采取独立自主的积极的作战方针；设立经常的国防会议，讨论和决定国防作战方针；武装人民，发展抗日的游击战争，配合主力军作战；改革军队的政治工作，使指挥员和战斗员团结一致，军队和人民团结一致，发扬军队的积极性；援助东北抗日联军，破坏敌人的后方；建立全国各地军区，动员全民族参战。第三，全国人民的总动员。全国人民除汉奸外，都有抗日救国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和武装抗敌的自由，废除一切束缚人民爱国运动的旧法令，颁布革命的新法令；释放一切爱国的革命的政治犯，开放党禁，全中国人民动员起来，武装起来，参加抗战，实行有力出

^① 《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24—325页。

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 动员蒙民、回民及其他少数民族,在民族自决和自治的原则下,共同抗日。第四,改革政治机构。召集真正人民代表的国民大会,通过真正的民主宪法,决定抗日救国方针,选举国防政府;国防政府必须吸收各党各派和人民团体中的革命分子,驱逐亲日分子;国防政府采取民主集中制,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国防政府执行抗日救国的革命政策;实行地方自治,铲除贪官污吏,建立廉洁政府。第五,抗日的外交政策。在不丧失领土主权的范围内,和一切反对日本侵略主义的国家订立反侵略的同盟及抗日的军事互助协定;拥护国际和平阵线,反对德日意侵略阵线;联合朝鲜和日本国内的工农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第六,战时的财政经济政策。财政政策以有钱出钱和没收汉奸财产作抗经费为原则;经济政策是:整顿和扩大国防生产,发展农村经济,保证战时生产品的自给 提倡国货,改良生产 禁绝日货,取缔奸商,反对投机操纵。第七,改良人民生活。改良工人、职员、教员和抗日军人的待遇;优待抗日军人的家属;废除苛捐杂税 减租减息 救济失业 调节粮食,赈济灾荒。第八,抗日的教育政策。改变教育的旧制度、旧课程,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新课程。第九,肃清汉奸卖国贼亲日派,巩固后方。第十,抗日的民族团结。在国共两党合作的基础上,建立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抗日战争,精诚团结,共赴国难。①

抗日救国十大纲领集中概括了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的基本内容,是全面的全民族抗战的纲领和宣言书。毛泽东指出,要实现全面抗战,必须使全国有一个彻底抗日的共同纲领,这个共同纲领就是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它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行动指南,也作为这个统一战线的一种约束;“像一条绳索,把各党各派

① 以上均参见毛泽东:《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54-356页。